

共青团改革的逻辑回归:历史与政治的解读

■ 胡献忠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北京 100051)

【摘要】在当代中国诸多政治关系中,“党—团—青”的逻辑架构始于历史、重在现实、指向未来。作为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以党的价值观引领青年,通过服务青年为党赢得青年,是共青团成立之初心,也是改革的逻辑起点。而共青团改革的核心要义在于变革工作运作模式,回归群团自身逻辑,更加有效地服务青年,在国家与原子化社会之间,不依赖于行政体系而要通过基层组织和骨干重建社会中间层网络。密切联系青年是共青团对政治组织转型之路有重要价值的实践探索。

【关键词】共青团 改革创新 逻辑回归 历史维度 政治维度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打算长期执政的政党,不仅需要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通过政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且总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和青年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运作模式来源于列宁式政党,其与青年组织(共青团)的密切程度截然不同于松散的欧美式政党。当代中国,执政党正在着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须清除党的外围组织尤其是共青团多年来形成的积弊,深度拓展其原有功能,恢复其联系群众、凝聚群众的活力。2016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中办发[2016]47号),此方案先后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政治规格如此之高,凸显了执政党对于共青团改革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正如文件所指出的,“推进共青团改革,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所有这一切的立足点,在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特殊的政治关系”^[1]。进而言之,党希望能够通过建设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的外围辅翼,赢得广大青年、赢得未来。如何从历史与政治的双重维度去理解共青团改革的逻辑、认识共青团改革目的与建团初心的关系、把握政治组织的转型之路,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框架。

一、不忘初心:聚拢青年的多少决定着对政党价值的大小

世界政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一个政党执政日久,如果缺乏有效监督和权力制衡,该政党及其共享执政资源的机构、组织均难免滋生官僚化、贵族化甚至发生严重的腐败,乃至迷失成立

收稿日期:2016-10-29

作者简介:胡献忠,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常务副馆长,副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政治与群团发展、国家建构与青年运动。

时的初衷。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当初为什么会成立?其奋斗目标何在?说到底,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进而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如此巨大的社会革命,仅靠政党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持。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面对“一盘散沙”式的中国社会,除了将自身组织渗透于基层民间之外,着手组建、壮大青年团、工会及妇女组织等,从多角度、多层次聚拢群众、组织群众就成为重要的政治战略。

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是作为党的辅翼而诞生的,主要功能是在青年群体中传播党的意志、主张,为党凝聚后备力量。1920年,陈独秀在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过程中,就主张“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1928年中共六大称,共青团“是青年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组织,在革命运动中他是党很有力的助手”^[2]。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共青团“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青年组织,是党的后备军,故党必须将帮助团发展工作看作是自己的任务”^[3]。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面临着艰巨的革命任务和严峻的斗争形势,需要通过发展共青团这样的外围组织,把更多的青年团结在党的旗帜之下。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的共青团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由于过分注重组织的先进性而忽视群众性,形成了关门主义、狭隘主义的不利局面,因而在抗战前夕被党改造为“民族解放性质的抗日的”青年救国会。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在党的直接领导下,青年团得以重建。新建立的青年团既注重克服原来共青团的狭隘性,又力避青年救国会的松散性。中共中央从战略高度对共青团的作用予以肯定:“过去和现在的经验都证明,青年团是党的有价值的助手和后备军”^[4]，“是党去团结与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5]。当时“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要团结和教育整个青年一代”^[6]。当大规模经济建设来临之际,青年团创造性地组建了各种青年突击队,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了青年群体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奋斗热情。因此,1956年9月中共八大再次重申,“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整个历史表明,它是党的可靠的后备军和有力的助手。”^[7]

共青团在革命年代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这一革命团体能够在党的统一部署下,有效发起学生运动、青年运动,造成群众运动的浩大声势;能够发动青年工农、青年学生参军参战,成为革命军队的重要兵源之一。共青团在建设年代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在这一群众团体的动员带领下,各行各业的广大青年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和突击队,并在此过程中被塑造成一代新人,以至当时的西方记者也惊呼:“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青年中找到了最大的力量”。改革开放年代共青团的价值在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执政党与青年组织是理念相同、行动相应的政治关系,即“党有号召,团有行动”。作为助手,党在青年工作领域需要什么,共青团就应该能够提供什么。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后曾谈到,党好比砌墙的建筑师,团好比打下手的小工。党向后一伸手,团要马上明白需要的是什么,砖还是灰,或者别的什么工具,并能马上递过去。这就是共青团的功能定位与政治价值所在。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青年的战略地位,其意义不仅在于未来,更在于当下。正因为如此,党才倡导、推动成立共青团,发展、壮大共青团,寄厚望于共青团。如果共青团脱离了广大青年群众,只与精英群体打交道,或孤立为若干团干部的集合体,就违背了建团的初衷,整个团组织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本价值。

二、互动逻辑：只有维护青年利益才能为党赢得青年的信仰

从“党—团—青”政治关系的制度设计上看，作为中国社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基本内核，党的各级组织、党员干部、普通党员在这个核心的外围形成第一个同心圆，作为助手和后备军的共青团干部和共青团员形成第二个同心圆，更广大的青少年又在共青团周围形成第三个同心圆。但社会运作不是标准的图上作业，“不怕团不跟党走，就怕青年不跟团走”的论调，也并非杞人忧天。中国共青团作为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靠什么来凝聚 8 600 万共青团员呢？笔者认为，一靠信仰，二靠纪律，三靠利益，四靠情感。而且，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一支没有坚定信仰的队伍，无异于一群“乌合之众”。信仰认同是首要条件和基本前提，因为共青团员是先进青年。我们要做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共青团员坚定不移地跟党走。这样，才有资格去谈吸引和凝聚广大青年。当然，对普通青年与共青团员需要差异化对待，既不能把共青团员简单混同于普通青年，也不能随意把普通青年拔高为共青团员，尽管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通过共青团员的有效带动来赢得青年，需要从信仰与利益的关系说起。

中国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僵化的计划经济被丰富多彩的市场经济所取代，“大一统”的单位制让位于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公共服务单一的政府供给融汇于社会化服务体系之中，排浪式消费模式式微，个性化“定制”勃兴，青少年的成长发展获得了多重选择和机会。一个多元化、个性化的时代到来了。在此背景下，青少年价值观多元化成为必然趋势。固然，一个期望达到百分之百共识的社会肯定令人窒息；同样，一个无限多元、没有底线共识的社会，必然沦为了一盘散沙。那么，当代中国如何实现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理性局面，如何帮助 80 后、90 后乃至 00 后青年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呢？

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922 年团一大纲领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要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另一方面要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其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路上走。”这里讲得非常清楚，“革命的精神”养成要建立在“为改良生活状况、为利益奋斗”的基础上。大革命时期的共青团总书记任弼时认为，要领导群众为其利益而斗争。使他们在斗争中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团体并使其获得信仰。他还专门撰写《怎样青年群众化》一文，分析了中国青年运动虽然有很好的下层基础而却未能使其深入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能注意到学生本身利益的斗争及文化运动，以致使学生群众不能坚固地团结在学生团体之下，反而不满于自己的团体，不觉得学生团体是他们利益的保护者。在工人方面，因为我们未能注意青工利益的斗争和宣传，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仰。换言之，就是我们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未能使青年群众感觉到本团是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领导者”^[8]。革命年代的共青团工作有这样一条基本定律：起于利益，收于信仰；起于社会，收于政治。

在利益格局深度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青年自主意识和个性化需求明显增强的社会背景下，广大青少年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政治思想教育不可能再进行“填鸭式”灌输。“网络一代”并不像计划经济单位体制下的青少年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在那样一个“政治挂帅”的社会氛围中自然会接受主流价值观，但今天这些思想视野更加开阔、权利意识更为强烈的网络原住民们对社会运作和政治现象抱有很大的好奇心和理性质疑。多元化时代的青少年接受执政党所推行的价值理念（尽管这些理念是顺应时代和国情的）的逻辑是什么？笔者认为，就如同

革命年代广大青年通过斗争实践和考验选择中国共产党一样,当代青年需要通过社会体验来获取对执政党的思想理念主张、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认同。换句话说,作为社会个体,青少年在通过自身实践选择的价值归依,远比外力灌输要更持久、更牢固。正因如此,从服务青年成长发展、维护和实现青少年利益入手,在服务中实现思想引领,也就成了共青团改革的基本逻辑。所以,2003年团十五大把“竭诚服务青年作为团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写进了团章,并坚持至今。共青团各级组织只有深深植根于青年之中,通过为青年成长提供有效服务而达到思想引导、信仰认同,才能为执政党所倚重。

三、核心要义:变革工作运作模式以利更加有效地服务青年

1978年以来,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和接纳逐渐由观念层面转向利益层面。缘于利益导向的观察视角,一提起改革,体制内人员所关注的往往是领导人数配置、机构部门调整、工作人员去留等。不可否认,组织创新是共青团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其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联系青年、服务青年、引导青年。我们常说,要让青年在改革中有获得感。换言之,当前共青团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密切共青团与青年群众的联系,让普通青年能够感受到共青团的温度,改革的指挥棒要围绕青年的需求转。破除“行政化”“机关化”“贵族化”“娱乐化”的目的也在于此。所以,共青团作为群众组织的运作模式,应该回归群团的自身逻辑。我们知道,教师有教师的工作方式,可以在办公室备课、批改作业,更多的是在课堂上传道授业、在学生中答疑解惑;警察有警察的工作方式,可以在办公室办理证照、研究案情,更多的是在街区里服务百姓、在人海中破案追逃。群团作为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可以在办公室分析材料、研究对策,但更多的应该是走出高楼大院,走进基层群众。

共青团要实现密切联系青年这一重要目标,显然不能完全依托于行政体系对青年发号施令,不能完全依赖于文件、会议、统计、报表,要像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在建团议决中所指出的那样,“以不知疲倦地说服教育工作和自己的模范行动”来赢得青年。对于基层团组织来说尤其如此,每一名共青团员都要充分发挥在青年群体中的模范作用和对青年的凝聚作用。胡耀邦在20世纪50年代就讲过,共青团各级负责同志要深入到青年群众中去,要广泛、直接地联系青年群众,要亲自了解不同阶层青年的思想感情。不要成天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想青年”,不要在办公室中透过玻璃“看青年”,也不能只满足于在下边送来的报告、材料中“找青年”。团的干部要亲自到青年中去,听取青年的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要找那些学习、工作成绩优异的青年座谈,更要找那些有困难、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甚至吃不饱、穿不暖的青年座谈,到工厂、到农村、到学校、到街道、到机关去和青年直接交朋友。尽管经历了六十多年的斗转星移,但政治组织的运行规律依然如昨。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政治组织的运作机制影响甚至决定着该组织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在重庆的群团改革试点中,重庆妇联实行了村社联系点制度。按照制度设计要求,全市市区两级妇联干部今后“稳坐机关”而不深入基层开展工作,将被视为考核不合格。

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中,作为执政党的青年组织,社会结构越复杂,越需要深入基层之中;青年需求越多元,越需要提升精准服务能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指出:“群团组织要重点帮助群众解决日常工作生活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和最困难、最操心、最忧虑的实际问题。”这其中也包括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众所周知,改革开放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个体逐渐成为一级利益主体,城乡、地

域、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由阶层分化带来的各利益群体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青年利益,共青团需要站在青年发展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审时度势,在现有政治体制内尽力而为。各个层次的团组织要按照本级职能边界和自身特点,分工协作,既要从政策层面关注青年普遍性需求的实现,又要调动全团资源为青年的个性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

目前正在推进的共青团改革,是执政党领导下的改革,涉及诸多体制机制,包括代表大会和委员会制度、领导体制、机关职能机构和运行方式、干部选拔使用和管理、工作活动内容和基层组织建设等。要深化这些改革,必须澄清认识,摆正心态和位置,深刻反思产生“行政化”、“机关化”、“贵族化”、“娱乐化”的原因。比如,受市场经济利益冲击、被党政体制裹挟、来自传统从政理念的影响以及从严治团不够等。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共青团干部都不应该是行政领导,而应是党的青年工作的实施者,要当好广大青年的知心人、引路人,这是团干部的基本定位。从组织层面讲,共青团应该是干事业的地方,而不是别人眼中“出干部”的地方。换言之,只有较为彻底地破除“官本位”意识和等级观念,共青团的各项改革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建立团青相融的工作模式和长效机制。

四、回归社会:在密切联系青年中探索政治组织转型之路

不论是政党执政、国家发展,还是社会进步,一个绕不开的基本逻辑是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两对关系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这些关系处理好了,则会政通人和,理性有序;处理不好,则可能民怨四起,矛盾激化。中国共产党来源于人民,根植于人民,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这条经验,治国理政也要靠这条经验。所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脱离人民群众视为党执政最大的危险。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老百姓是那定盘的星”。政治不仅仅需要庙堂之上的运筹帷幄,更需要来自基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西方政党普遍认为,“拥有选票的选民是政党的生命”。法国社会党提出,“党要回归社会”。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南非非国大则将执政比作是签署了“人民的合同”。不论是竞争性政党还是协商性政党,脱离基层民众的后果必然是被民众所抛弃。

世界各种政党的执政理念虽然也多有相通,但要坚持且做好并非易事。现阶段,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又重申了这四种考验、四种危险。这既是面向全党的,也是面向所有群团组织的。因为群团组织本身就是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更没有任何理由脱离群众。众所周知,群团各级机关均属体制内组织,依托执政党和现有行政体系,得先天之利,拥既定之势,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机关化”、“行政化”等现象。在物质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群团组织离群众不是近了,而是远了;联系群众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为什么?这与在长期执政环境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的“政治城堡”以及群团对政治体系的路径依赖有很大关系。如果你有兴趣,不妨在闹市街头做一个随机拦访,就明白群团组织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在普通群众中跌落到何种程度。我们常说,形势会教育人,危机倒逼改革,“不改革不转型,早晚变恐龙”。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群团组织没有任何理由陶醉于局部的经验和成绩而拒绝或延迟改革。

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在众多的群团中政治属性最强,甚至可以说与政党一样,具有利益表达和整合功能、政府和个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功能、政治社会化

功能、政治精英培训功能等。而且,中国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最为密切,“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党的重大战略就是团的历史使命。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整合社会各方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中华儿女的积极性。现代社会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社会主体之间一改农业经济背景下的封闭状态,不再是工业经济环境下批量生产、排浪式的消费关系,而是要构建虚实相生的社会组织网络与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整合的工作量和难度都在增大。执政党要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全体社会成员实现整合,共青团同样要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全体青年进行整合,虽然一个是全局,一个是局部,但却有着很强的内在相似性。

自1978年中国社会转型至今,移动互联网已经与广大青少年形影不离,利益对信仰的剥蚀依然持续,青少年价值多元化趋势加强,各种青年社会组织蓬勃兴起,共青团传统工作空间面临空前的压力和挑战。组织青年遭遇青年原子化和自组织化的双重逆袭,引导青年遭遇青少年政治意识弱化的严酷冲击,服务青年受限于资源不足,维护权益受限于力量不强。共青团自身备受“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袭扰,基层组织涣散,团员意识淡薄。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走出政治组织在利益时代的功能困境,重构共青团与青年的密切关系,不借助国家行政体系而是依靠基层骨干组织,通过构建枢纽型平台去整合青年,巩固政治组织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结构性地位,正是共青团改革的前瞻性价值。如果说共青团的改革能对党组织有所启发和帮助,其意义大抵也在于此。

结语:透过历史的长镜头,我们发现,中国共青团作为中国共产党联系青年群众的制度化组织载体,诞生锤炼于农业经济下的革命岁月,蓬勃成长于国家开始工业化的建设年代,发展探索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改革初期,转型求变于进入信息化的21世纪。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组织结构。也就是说,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党的历史方位的变迁和政策调整、青年世代特征的新发展和青年群体结构新特点的显现,共青团事业需要与时俱进,因此共青团的改革创新就成为必然。无论共青团如何改革,总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贯彻党的战略意图,二是融入青年群众之中。两者如车之双辐,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我们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求智慧,在政治格局中重拾初心。当然,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也是一个政策选择的过程。很多问题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而之前的破解力度有些不足。要一揽子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立足有效的历史经验和正确的政治方向,蹄疾步稳,持久发力,创造出新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模式,以制度固化改革成果。

[参 考 文 献]

- [1]《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7页。
-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2页。
-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9》(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 [4]胡献忠:《中国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概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页。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 [6][8]《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6、20页。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页。

(责任编辑:邢 哲)